

梁作楫 著

罗马帝国

与汉晋帝国

衰亡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史

K126

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衰亡史

梁作楦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03654⁴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衰亡史/梁作楦著.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7

ISBN 7-5361-2042-7

I. 罗… II. 梁… III. 古代史-对比研究-古罗马、中国
IV. 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4563 号

3082/19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402 千字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定价: 33 元

序

这里展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衰亡史》，是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梁作楫教授的一部重要学术专著。梁先生生前是暨南大学教授，是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的学术顾问，是学贯中西而有成就的古史专家。他的这一部书撰写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经有打印稿本两册在同行学者中流传。承梁先生的好意，那时也曾惠赐我一部。我读后觉其中新意甚多，给我启发很大，所以也曾介绍给我的朋友和学生看。由于借来转去，这部书后来就找不到了，实在感到可惜。现在陈远峰教授作了大量工作，使此书即将正式出版，并嘱我写一篇序。论学术水平，我并不足以任此，不过为了向亡友梁先生表示敬意，也有感于好友陈先生的古道可风，故不辞谫陋，谨略述个人对于此书的认识于下，以就教于各位专家和读者。

梁先生为何而著此书呢？这可能是人们首先会想到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他在本书的《绪言》中已经说到，在他看来，论中国与外国古史，事虽不同，而基本道理应该是一样的；可是“现在的情况是：任何一个并非内行的人，只要翻看随便一本《中国古代史》（尚钺的著作除外），他就总会发现在理论上世界史讲的是一套，而中国史讲的又是另一套，两者格格不入。”他是为了解决这种矛盾现象才撰写此书的。可是，梁先生所感到的矛盾现象在当时并非每一位历史教师或学者都能感觉到的。因为专门从事中国古史或外国古史的教学或研究的人一般是难以注意及此

的。梁先生既从事于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又留心于中国古代史之研究，在比较中乃发现了此种问题。在50年代，我教世界古代史，也意识到了这门课的内容在一些方面和中国古代史在“唱对台戏”。可是我的教中国古代史的朋友就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在发现矛盾这一点上我和梁先生是有同感的，但是梁先生为此而有斯书之作，而我则愧未能。这是我不能和梁先生比拟的地方。

梁先生的这一部书是对中外古史作系统比较研究之作。这样就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之衰亡史作系统之论述，据个人所知，在国内尚无先例。然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梁先生书中的见解在学界里是有不同意见的。对于这些，梁先生本人也很清楚。他在此书《绪言》中说：“有些学者甚至反对把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作比较研究，认为这是削足适履，生搬硬套。这种情况在实践过程中，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的。但否定比较研究的态度是非科学的。”就是根据不同意见而说的。我觉得梁先生的话说得很好，尽管比较研究中也也许会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历史的比较研究本身是必不可少的。

我非常赞赏梁先生的上述意见，是因为历史的比较研究本身就只能在进行的过程中发展、完善起来。我常说，比较研究一般都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直观地看到了不同事物之间的异，犹如初进一个大学教室看到满屋人的面孔皆异一样；如果比较研究就停在这个阶段，那么所见的只能说是现象。第二阶段是，经过抽象而看到了不同事物之间的同，犹如站在那个教室里一想（一作抽象），就发现这里原来都是一群知识分子；到了这个阶段，认识开始接触到了本质。第三阶段是，由抽象再上升到具体，犹如站在那个教室里再加分析，就发现其中还有青年与长者之别，有教者与学者之别；只有到此阶段，才知道这一教室的

人是怎么样由不同部分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的，从而认识才真正深入了本质。也可以这样说，这就是认识经历了感性、知性与理性三个阶段便完成了一个具体过程，当然，认识本身并未终结。必须说明的是，我这里把比较研究的发展过程很容易地就说过去了，而实际的历史比较研究过程却是非常艰苦的。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谈何容易；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则难上加难；而在第三阶段中的充实与完善，那就常常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事了。我以为，梁先生的比较研究总体上已经达到了第二阶段，在若干具体问题上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他已经看到了第二阶段上的某些弱点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的。”这表明，他作为一位学者是谦虚的、诚实的，也是自觉的。唯其如此，他才总想修改他的书稿，以至辛勤地工作到病危入医院以前。在医院中他还口授了三点修改此书的意见（见梁先生女公子紫虹的《后记》）。呜呼，梁先生逝矣，而未能亲手修订此书以底于成。虽然，于此亦可见梁先生学术人格之完美已。且夫学术固有止境乎？学术著作亦固有完美无缺而无可修改者乎？此皆不待智者而后知其必不然也。故梁先生此书亦不可以谓之为不完之作。何况陈先生与紫虹已遵梁先生之嘱有所修订。如有好学深思之士，读梁先生此书而能得其意，于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之领域有新拓展，则梁先生此书之出版亦不虚矣。

刘家和

1996年10月谨序于

北京师范大学补拙未暇书室

目 录

序	刘家河
绪言	(1)
第一章 世界古典文明的两大中心：罗马帝国 与汉晋帝国	(7)
第一节 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形成的历史前提	(8)
第二节 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经济的发展	(25)
第三节 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文化的发展	(37)
第二章 世界古典文明的危机：危机的根源 及其最初征兆	(51)
第一节 公元前二至一世纪罗马国家的社会问题	(51)
第二节 公元前二至一世纪汉晋帝国的社会问题	(60)
第三章 人民运动的高涨与古典社会的最后稳定时期	(74)
第一节 罗马民主制度的恢复及其实质的衰败	(74)
第二节 屋大维·奥古斯都的内外政策	(80)
第三节 汉武—王莽反动制度的崩溃与东汉政权 初期的内外政策	(87)
第四节 汉帝国的最后稳定时期与东汉政权的腐朽性	(101)
第五节 罗马国家制度官僚化的加深与实际上的 君主政体的形成	(108)
第六节 安托尼王朝——罗马帝国的最后强盛时期	(119)
第七节 公元一至二世纪罗马奴隶制经济制度的演变	(128)

第八节	东汉帝国经济制度的演变与经济状况的恶化	(138)
第四章	基督教与佛教	(154)
第一节	基督教的产生：社会政治条件和观念前提	(156)
第二节	基督教的演变及其与罗马政府的关系	(175)
第三节	佛教在汉晋帝国的传布	(184)
第五章	二世纪末与三世纪的危机	(196)
第一节	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	(196)
第二节	塞维鲁王朝(193-235年)	(201)
第三节	罗马帝国政治危机的加深	(208)
第四节	“黄巾”流民无产者起义与东汉帝国的政治危机	(223)
第五节	魏、蜀、吴三国分立时期的政治与经济	(229)
第六节	曹魏政治路线的演变与西晋统一的政治意义	(249)
第六章	三世纪末和四世纪的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	(262)
第一节	戴克里先“君主制”的建立及其国内政策	(262)
第二节	君士坦丁的统治与四世纪罗马社会的基本特征	(272)
第三节	西晋的黑暗统治与北方汉晋社会的胡族(蛮族)化	(285)
第四节	八王之乱、胡族入侵与晋室东迁	(297)
第七章	罗马帝国的分裂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312)
第一节	君士坦丁继承者的内讧	(312)
第二节	基督教的宗派斗争与朱里安的宗教政策	(319)
第三节	罗马帝国的分裂	(330)
第四节	人民运动、蛮族入侵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349)
第八章	四至六世纪的东罗马帝国与东晋·南朝帝国	(369)
第一节	东晋社会的腐朽性	(370)
第二节	南朝帝国的没落	(383)
第三节	东罗马帝国的社会状况与查士丁尼的反动政策	(392)
第九章	晚期罗马与汉晋帝国的思想与文化	(412)
第十章	七世纪以后的东罗马帝国	(430)

附录一：《私有财产形态论》	(458)
附录二：作者所著论文一览表	(498)
后记	(500)

绪 言

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的衰亡时期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大转折时期。在晚期罗马与汉晋帝国存在的最后三百年中，西方从公元3-5世纪，东方从2-4世纪大致同时出现了长期的、全面的、根本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衰落现象。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罕见的。“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统治的最终结果”，^[1]也是汉晋人的亚洲统治的最终结果。罗马人和汉晋人的统治使古代世界走进了绝境：没有出路。只是通过不断爆发的人民运动的反奴役的斗争，并伴随着大规模的蛮族的入侵，才使古老的欧洲和亚洲再次获得了生命力。即使如此，人们还看到，在西罗马帝国和汉晋帝国灭亡以后的四百年间，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水平还没有根本性的上升，社会经济的恢复是十分缓慢的。在经历了前后七百年的经济衰落和发展停滞时期以后，西方从10-11世纪，东方从9-11世纪起，才出现了社会经济和文化再次高涨的趋势。这就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最大曲折。

近代西方历史学家早就从欧洲的历史过程中看到了这一曲折，并认识到罗马帝国的衰亡的严重意义。如下事实说明了这一点：著名英国历史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年）以《罗马帝国衰亡史》为题写了六卷本的巨著；大多数学者以西罗马帝国正式失去存在的一年——476年作为划分古代和中

世纪历史的时代界线；这些历史学者几乎无例外地认为自4世纪末叶起，在西欧历史上开始了一个一直延续到11世纪的“黑暗时期”。这些历史学者虽然未能理解罗马帝国崩溃的实质内容和社会意义（他们把它看作是“自古典文明过渡至基督文明”）；而所谓“黑暗时期”的说法也只是从社会表面现象看问题。然而，他们毕竟观察到西欧历史的根本转折（即3-5世纪长达三百年的经济衰落以及6-10世纪长达四五百年的经济停滞时期，然后从11世纪起恢复了经济和文化的新发展），并为此搜集和整理了许多历史资料，从而对推动历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在此基础上，其后的历史家从世界历史整体性的视角出发，看到了西方和东方历史的发展存在着不少共同点。其境况有如著名美国汉学家、已故费正清教授所说：“几代学者都对古代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中一系列事件的特别类似之处获有深刻印象：都有一段诸子争鸣和战国纷争的时期，有大一统与成立帝国的时期，有中央政权分崩与瓦解的时期。例如，我们注意到，孔子及其弟子约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同时代；亚历山大大帝只比秦始皇早一百年；罗马和汉这两个帝制政权也鼎盛于同一时代。同样，当这个帝国衰微之时，其北方边陲的蛮族都变得越来越危险，而当‘普世之国’中的政治和经济解体时，都可见到苦难人民向其寻求安慰的外来宗教的传播的特征。3-6世纪北方游牧民族的进入中国和佛教的传播，正好同西方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南侵以及基督教的传播，即‘野蛮状态和宗教’的胜利同时。凡有志于正确地找出人类事物规律的人，都可拿东西两大帝国的这些相似之处作为出发点，来进行概括和更深入的研究。”⁽²⁾在费正清看来，对东西方历史进行比较研究，是正确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不过，尽管人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现代西方“比较历史学”在实践上并未取得真正的

成功。例如，美国历史家梯加特（Frederick J. Teggart）所著《罗马与中国》一书将罗马与汉晋中国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按年代次序精心排列，进行类比与分析，认为罗马与中国早在二千年前就有着某种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因此之故，当时中国政府的各种重大决策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欧洲社会的进程。⁽³⁾综观全书，梯加特并未能为他的如此不同寻常的理论提供令人信服的论证和事实依据。但他对古代东西方两大帝国历史关系的精湛研究，表明他对古代世界历史整体性的重视，以及对事物发展的普遍联系的某种认识。这对于一些习惯于脱离世界历史孤立地观察中国历史进程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有感于西方历史家的研究欧洲和世界历史上所取得的成绩，人们本可期望，近代中国历史家在研究中国和东亚历史上也能作出相应的贡献。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近代中国历史家不曾认识东方的罗马帝国即汉晋帝国覆灭的严重意义，甚至也不曾从一二世纪至七世纪（即东汉至唐初）这一空前长期的经济衰退和发展停滞的戏剧性现象中获得深刻的印象。他们也没有提出按照近代观点理应提出的关于这段时期的历史的内容是“从古典文明过渡至佛教文明”的论点（类似这样的论点尽管是不适当的，但对历史研究毕竟具有启发性，而且在史学史和人类认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象征意义）。这大概是由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短暂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不成熟性限制了近代历史家的眼界，并制约了他们的学术工作（包括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所以也是不可厚非的。

现代中国的历史科学是力图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的，它在中国古代和中世纪历史的某些方面的研究上已经取得许多可喜的成果。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在上述观察历史的根本点上，迄今仍未取得应有的突破。它距离科学地阐明中国历史发展

规律性的要求仍十分遥远。在这种背景下，就出现了所谓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停滞（自西周或战国时代以来）的学说。这个学说脱离了上述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

这种研究方法还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现代中国的许多古代史研究者并不想否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上得到阐明的欧洲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但却认为这种规律性并不适用于中国，而宁愿强调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因而对西方历史发展的道路使用了不同标准。有些学者甚至反对把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作比较研究，认为这是削足适履，生搬硬套。这种情况在实践过程中，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的。但否定比较研究的态度是非科学的。我们不曾听说过有一套仅适用于欧洲自然界的生物学或物理学理论，而又有另一套仅适用于中国自然界的生物学或物理学理论。人们知道的只是同一体系的真正科学的生物学、物理学理论。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难道可以有两个体系的科学理论吗？难道可以在分析欧洲历史，例如在分析古希腊罗马历史时遵循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阐明的关于国家起源的科学观点，而在分析古代中国历史时又在实际上公然对抗这种观点吗？当然，这些学者并不认为他们在对待东西方历史时使用了双重标准、双重理论，更不愿意认为（或并非自觉地认为）自己在对抗恩格斯的观点，但不幸的是，事情的实质确是如此。不然，他们又为什么要反对把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作比较研究呢？现实的情况是：任何一个并非内行的人，只要翻看随便一本《中国古代史》（尚钺的著作除外），他就总会发现在理论上世界史讲的是一套，而中国史讲的又是另一套，两者格格不入。事实难道不正是这样吗？这就是某些学者不愿意把中外历史作比较研究的原因。但比较研究的方法毕竟是不可少的、甚至可以说是基本的科学方法。不进行比较，就不能作出鉴别，就不能

确定各种不同事件的性质。故反对比较，实际上就等于是反对科学。

但比较研究只是一种研究方法，比较本身还不是科学。目前国内史学界对进行东西方历史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已日益认识，人们也在比较研究中对历史本身的规律性的理解得到许多启发。这是一种好现象。但若仅从事物的表面现象进行比较研究，仍难免有穿凿附会之失，不能达到历史研究的科学性的要求。只有把比较研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上，特别是置于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而生产关系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它在法律上的表现是财产形态）的理论上，才能对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即东西方历史的共同规律性及其表现形式的特殊性加以正确的说明。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东西方历史的比较研究，就能看出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原有地位，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规律性获得更加深刻的理解。这是本书的基本思想。国外史学界关于“比较历史学”的概念，不能反映出本书的根本出发点，因为它没有走上正确的哲学思维的道路，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道路。

本书叙述的只是罗马与汉晋两帝国衰亡的历史，但鉴于罗马和汉晋帝国是当时世界古典文明的两大中心，它在基本上就是叙述了公元前几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必须把古代中国历史看作是古代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即必须把握世界历史的整体性，才能坚持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要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作者只是勉力为之。

如所周知，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分期问题，长期以来在国内史学界存在着种种分歧意见。这个问题似乎是极端复杂的，但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要知道，自汉唐以来，历代的一些知名学者都曾如实地指出过两汉时代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事实。因此，只

要是能够实事求是地探讨历史事实，问题本身是明白无误、无可争议的。作者认为，应把近年以来我国史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分期问题的讨论推向一个新阶段：不应继续停留在 50 年代那种仅限于谈论历史现象的水平，而必须抓住所有制（财产形态）这一根本问题从东西方历史比较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4]。如果大家都不回避这个问题，并共同努力来研究，那么，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迷雾就不难驱散了。

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的衰亡，如前所述，既是世界历史发展中仅见的一次重大转折，对这种转折加以科学分析，无疑是有助于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性的全面认识的。限于作者的学识水平，要完成这项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但鉴于这项任务的迫切性，作者也就乐于作此初步的探索和尝试了。本书初稿曾作为暨南大学历史专业选修课《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衰亡史》的教材（1981 年 12 月打印本），恳切地希望得到学者们的指正。

注释：

- [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46 页。
- [2]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76 页。
- [3] 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研究》（丘进译），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4 年版。
- [4] 参阅拙作：《私有财产形态论》，《暨南大学学报》，1979 年创刊号、1980 年第 1 期。见本书末。

第 一 章

世界古典文明的两大中心： 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

古典文明世界在经历了长期的（二三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后，到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时，自然形成了两个巨大的古典文明中心：在西方，是囊括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帝国；在东方，是占有了大部分中华地区的汉晋帝国。两帝国在疆域面积上大致相同，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大致相等（罗马稍高一些）。处在两大帝国中间的广袤地带——伊朗、中亚和南亚地区，虽然在古代历史发展的前一阶段上不失为文明古国（早期文明），但由于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缓慢、社会关系的停滞，再加上落后游牧民族的入侵，到公元前3至2世纪以后的下一历史时期，已经赶不上时代的步伐，在罗马和汉晋帝国的光芒照射下，不免黯然失色了。

在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印度河、恒河和黄河的肥沃河谷，以及爱琴海沿岸地区和一些岛屿上所产生的早期文明，对形成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这两个巨大的古典文明中心作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除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外，这些地区后来都成了罗马与汉晋帝国的组成部分。出人意料的是，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就其所处的居间地位而论，不仅未能形成

为第三个巨大的古典文明中心，而且从公元1世纪中至2世纪初年起竟成为中亚游牧民族贵霜人的牺牲品。这就令人感到有必要探讨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和途径，而且不能不看到，这些历史现象对世界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影响以及对中世纪历史进程的特点所具有的规范性的意义。

第一节 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形成的历史前提

在罗马与汉晋帝国的极盛时期，帝国周围都是蛮族世界。当时虽然还有存在于两大帝国之间的所谓安息王国和贵霜王国，并占有了伊朗、中亚和印度河、恒河中上游地区，但它们的统治者都是来自黑海以东的草原或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部落的上层分子；这些人的专制统治阻碍了这里曾经一度是希腊化国家或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国家的社会的发展。因此，傲慢的罗马人把安息人看成是蛮族，对它不断发动战争。自认为是中央之国的汉人也把以印度为政治中心（富楼沙城，今白沙瓦）的贵霜王国的中亚领土视为戎狄所居的“西域”，派遣西域都护班超等人不断经略。罗马人和汉晋人的国家所以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并不是偶然的。这是来源于地中海地区和中华地区经济和文化的较高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社会前提是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胜利，或至少是取得十分积极的成果。

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爆发于一切早期国家。这是因为原始氏族公社制度虽然原是一种民主的社会制度，这种民主制度在氏族还是以母系血统为基础的时代曾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是随着氏族从母系向父系的过渡，这种民主制度也开始向它的对立面——贵族制度转化。氏族在其发展的后一阶段逐渐贵族化，乃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普遍规律，因为随着父权制而来的是动产私有制的出